



中国图书文化史

主编 曹之

中国古代图书史

曹之 著



武汉大学出版社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

中国图书文化史 主编 曹之

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

中国古代图书史

曹之 著



武汉大学出版社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代图书史/曹之著. —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15. 4
(中国图书文化史/曹之主编)

ISBN 978-7-307-11830-0

I. 中… II. 曹… III. 图书史—中国—古代 IV. G25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29798 号



责任编辑: 胡程立

责任校对: 汪欣怡

版式设计: 马 佳

出版发行: 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 cbs22@whu.edu.cn 网址: www.wdp.com.cn)

印刷: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20 × 1000 1/16 印张: 45.25 字数: 650 千字 插页: 2

版次: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11830-0 定价: 1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不得翻印; 凡购我社的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总 序

我是一个不好写序的人，尤其不喜欢写代序。鲁迅先生曾经说过：“代序却一开卷就看见一大番颂扬，仿佛名角一登场，满场就大喝一声采，何等有趣。倘是戏子，就得先买许多留声机，自己将‘好’叫进去，待到上台时候，一面一齐开起来。”（《准风月谈·序的解放》）为了回避“吹鼓手”、“戏子”之嫌，我决意不为“代序”，因此得罪了一大批人，包括我指导过的几位博士生。不过，经过解释，博士生们已经理解了我的初衷。导师为博士生写序，似乎成为一种“专利”，我愿意放弃这种“专利”。这篇序言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因为当了“主编”，总要讲几句话。

人们常用“图书大世界”形容图书之多。的确，世界充满图书，图书充塞世界，图书无处不在，无时不有，人类生活在图书的层层包围之中。人们常用书山、书海、汗牛充栋、恒河沙数、连窗委栋、擢发难数、积如丘山等词语形容图书之多，一点儿也不过分。自古以来，我国就是一个读书的大国，众多褒贬不一的“读书迷”，有五花八门的称号，清张培仁《妙香室丛话》卷六云：

汉世目郑康成为“经神”；何休为“学海”；晋杜预有“左传癖”，人目之曰“武库”，言胸中无所不有也。江祐目许懋为“经史笥”；梁世目任昉为“五经笥”。褚遂良目谷那律为“九经库”；又目虞世南为“行秘书”，皆美其淹识群书也。至晋傅迪好读书而不解其义，刘柳惟读《老子》，迪每轻之，柳曰：“卿读书虽多，而无所解，可谓‘书簏’矣。”唐李善淹贯古今，不能属辞，人号“书簏”；齐陆澄世称硕学，读《易》三年，不解文义，欲撰《宋书》不就，王俭戏之曰：“陆公，‘书厨’也。”似犹有讽焉。他如宋宜黄李郭，文学浩博，人号为“书厨”；福清郑格，博闻强记，时亦号“书厨”；莆田李纲，通诸史百家，人亦目为“书厨”；通州张大中，群经百氏，一览不忘，人目为“黑漆书厨”；邛州吴时敏，于为文未尝属稿，人目之为“立地书厨”，明武进陈济，六经子史，无不究竟，时称为“两脚书厨”；南海唐奎，遍览诸书，称为“唐书柜”。或有过誉，要皆美词也。

随便打开一部词典，就会发现由“书”组成的关键词滚滚而来，如：书卷、书帙、书城、书籍、书笈、书笥、书香、书院、书袋、书钞、书桌、书台、书种、书影、书录、书虫、书囊、书楼、书厄、书跋、书口、书脊、书缝、书祸、书价、书史……由图书而命名的斋堂室名也很多，如读书堂（司马光）、绉书阁（叶梦得）、万卷楼（尤袤）、野史亭（元好问）、汲古阁（毛晋）、赖古堂（周亮工）、士礼居（黄丕烈）、思适斋（顾广圻）、十驾斋（钱大昕）、积古斋（阮元）、四当斋（章钰）、双鉴楼（傅增湘）、瓜蒂庵（谢国祯）……甘桁《斋名集观》（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5 年版）著录的 1000 多个室名大多与图书有关。与图书有关的行业也很多，如书店、书铺、书局、书肆、书林、编撰、出版、发行、藏书、校勘、辨伪、辑佚……三百六十行生意，不少生意和图书有关。与图书有关的故事也很多，如囊萤、警枕、映雪、三余、三上、推敲、祭书、断织劝学、凿壁偷光、一字之师、著书自娱、露钞雪纂、断齑划粥、十年磨一剑、三年不窥园、头悬梁锥刺骨……詹文元等编《勤学成才故

事 160 个》(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2 年版)讲的都是与图书有关的故事,该书第 76 则故事云:唐代武后年间,河阴有位叫郝珍的人,家贫如洗,但酷爱读书。晚上没有灯光,不能读书,非常苦闷。突然发现富户邻居的墙角有一线灯光,郝珍便仿照汉代匡衡“凿壁偷光”的故事,把透光的缝隙凿大,趴在地上读书,津津有味。后来,邻居发现了这个秘密,一纸诉状把郝珍告上官府,诬称郝珍意欲盗窃财物。郝珍实话实说,称自己为了借光读书,并无他意。县官康庭芝亲自审理此案。他经过调查研究之后,作出一审判决,在《对求邻壁光判》中说:

郝珍荷衣横带,缉柳编蒲,有贱赢金,将希片玉。南都自富,北郭实贫。殊谢梁鸿,不求因热。乃如苏季,愿借余光。已接武于匡衡,方齐踪于甯越。室仞非遽,未窥夫子之墙;纺绩可兼,辄凿邻人之壁。情非窃伏,事涉穿窬。抑有前闻,宜征故实。请从按记,不合论辜。(《全唐文》卷二百六十《康庭芝》)

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我的家乡:河南省荥阳市广武镇。广武,因在黄河南岸,唐称河阴县。与图书有关的学问更是多如牛毛,如周易学、尚书学、诗经学、三礼学、春秋学、史记学、汉书学、尔雅学、本草学、水经学、通鉴学、文选学、四库学、红学、经学、史学、子学、编撰学、版本学、传播学、校勘学、辨伪学、辑佚学、阅读学、目录学……随着时间的流逝,科学研究向细密发展,学中有学,学又有学,子又有孙,孙又有子,子子孙孙,无穷匮矣。

历代图书知多少?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。就拿线装古籍来说,我在《中国古籍版本学》第二版(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)中曾据下列数字进行过一次粗略统计:

(一)上海图书馆编《中国丛书综录》著录丛书 2797 部,子目 7 万种,去其重复,计有单种文献 38891 种;

(二)清代乾隆以前没有收入丛书的古籍单行本至少有 1 万种;

(三)清代乾隆以后没有收入丛书的古籍单行本,据孙殿起《贩书偶记》与《贩书偶记续编》著录,计有 1.6 万种;

(四)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的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共著录方志 8200 种;

(五)佛经单种文献 4200 种;

(六)道藏单种文献 1500 种;

(七)据全国 59 个图书馆联合编制的《中医图书联合书目》著录,中医单种文献约有 7661 种;

(八)碑帖、舆图不少于 1 万种;

(九)少数民族语言图书不少于 1 万种;

(十)车锡伦编《中国宝卷总目》著录成代宝卷 1579 种;

(十一)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《中国家谱综合目录》著录家谱 14719 种;

(十二)谢巍编《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》著录历代年谱 6259 种;

(十三)许保林编《中国兵书知见录》著录存世兵书 2308 种;

(十四)杨忠、李灵年编《清人别集总目》著录清人别集 4 万种;

(十五)王宝平等编《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》著录和刻本 3063 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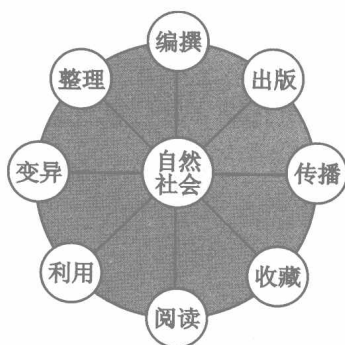
以上 15 个数字相加,共得线装书 174380 种,去其重复(还有少数现代著作、平装图书等),加上诸目漏收的线装古籍,总数当不少于 15 万种。如果加上复本,单是传世至今的古代线装书,当不会少于 1000 万册。历时 15 年编撰成功的《四库全书》收书 3503 种、79337 卷,共计 9.97 亿字。18 世纪中叶,法人狄德罗主编的《百科全书》共计 2268 万字,《四库全书》是它的 44 倍。若把《四库全书》约 4000 万页逐一摊开,首尾相接,可绕地球赤道 1.34 周,简直是

一个天文数字。可见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，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。实际上，古代图书可分两个大类：亡佚图书和传世图书。二者相比，由于自然老化、天灾人祸等原因，亡佚图书的数量当远远超过传世图书的数量，传世图书只是亡佚图书的若干分之一。历代许多文献学家试图计算出比较接近实际的图书数量，但是一个个大汗淋漓，无功而返。最后只好老老实实用“浩如烟海”四个字作为结论了。

图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，是一环紧接一环的锁链式运动过程，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一环节上。每个环节的发展又与社会生态文化密切相关，没有“单干户”。现在，关于图书的学科很多，出版专业有“古籍编撰史”、“古籍出版史”等；图书馆学专业有“古籍分类”、“古籍编目”等；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有“古籍校勘”、“古籍辨伪”……各种学科之间判若鸿沟，壁垒分明，“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”，大有中分天下、一决雌雄之势。静言思之，这些学科局于一隅，实则专科文献学，目前尚无真正海纳百川的广义文献学。对于各个专业来说，从微观上划分“势力范围”，固然需要，但从宏观上鸟瞰天下，也不可少。只讲微观，不讲宏观，容易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。中国有句俗话：“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”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当局者“迷”在微观，旁观者“清”在宏观。从横的方面看，“当局者”没有看到大千世界，或者没有把大千世界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；从纵的方面看，“当局者”没有看到悠悠岁月，或者没有把悠悠岁月看做一个承前启后的系统。“当局者”跳不出一地、一时、一人、一书的狭小范围，不能耳听六路、眼观八方，不能“会通”地研究问题，因而迷惑不解。苏轼《题西林壁》诗云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这首诗是“当局者迷”的形象写照。

古代图书发展的历史就是从图书编撰出发，经由图书出版、图书传播、图书收藏、图书阅读、图书变异、图书整理，进入新一轮的图书编撰。其中，“传播”包括书业中心、畅销书、中外交流等；“收藏”包括目录、分类、保护等；“阅读”包括标点、训诂、检索、翻译等；“变异”包括伪书、散佚等；“整理”包括校勘、辨伪、辑

佚等。一部图书史就是这样无限循环、环环相扣、周而复始、螺旋式上升、不断发展的历史，如下图所示：



基于上述认识，我拟把中国图书文化的发展分为“中国图书编撰史”、“中国古书编例史”、“中国图书官修史”、“中国图书序跋史”、“中国图书抄写史”、“中国印刷术的起源”、“中国图书刻印史”、“中国图书版本学”、“中国图书装帧史”、“中国图书插图史”、“中国图书发行史”、“中国图书广告史”、“中国古代禁书史”、“中外图书交流史”、“中国古代聚书史”、“中国秘书省藏书史”、“中国图书散佚史”、“中国图书目录史”、“中国图书分类史”、“中国图书保护史”、“中国图书阅读史”、“中国图书训诂史”、“中国图书翻译史”、“中国图书整理史”、“中国图书校勘史”、“中国图书辨伪史”、“中国图书辑佚史”、“中国图书与生态文化史”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题目。

作为教师，我们的一生就是藏书、读书、著书、教书的一生。生活就是图书，图书就是生活。用“嗜书如命”四个字来形容，一点儿也不过分。除了文盲，每一个人都有终身难忘的与书有关的经历，每一个人都有刻骨铭心的与书有关的故事。一本书就是一位老师，一本书就是一个台阶。图书，打开了一扇透风的窗口；图书，改变了我们的命运。爱书吧，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鲁迅先生也很爱书，他说：

该如爱打牌的一样，天天打，夜夜打，连续的去打，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，放出来之后还是打。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，而在有趣。牌有怎样的有趣呢，我是外行，不大明白。但听得爱赌的人说，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，永远变化无穷。我想，凡嗜好的读书，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。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。（《而已集·读书杂谈》）

早就想编一套关于图书文化的丛书，表达我们对于图书的无限感激之情。由于种种原因，这次收入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的暂时只有以下 13 种著作：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（一）《中国古代图书史》 | 曹之著 |
| （二）《中国古籍编撰史》 | 曹之著 |
| （三）《中国古书编例史》 | 马刘凤、曹之著 |
| （四）《中国图书官修史》 | 霍艳芳著 |
| （五）《中国古籍序跋史》 | 王国强著 |
| （六）《中国古代文献的保护》 | 王国强等著 |
| （七）《中国印刷术的起源》 | 曹之著 |
| （八）《中国古籍版本学》 | 曹之著 |
| （九）《中国图书发行史》 | 孙文杰著 |
| （十）《中国秘书省藏书史》 | 郭伟玲著 |
| （十一）《中国图书散佚史》 | 李玉安著 |
| （十二）《中国古代的藏书印》 | 吴芹芳等著 |
| （十三）《中国古籍校勘史》 | 罗积勇等著 |

其中，《中国古籍版本学》、《中国印刷术的起源》和《中国古籍编撰史》三书已于多年前出版，社会反映尚可。武汉大学出版社坚持要把三书纳入该丛书一并出版，我也只好遵命，十分感谢出版社的美意。该丛书作者大多从事古典文献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，具有硕士、博士学位，有的已是教授（研究馆员）或博士生导师，且已出版过多种著作，具有较好的专业知识和写作经验。2007 年年底，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初定书名、著者之后，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。

几年来，作为主编，我做了以下事情：（一）草拟分册提纲。提交编务会议进行讨论，以期集思广益，统一认识。（二）编制《中国图书文化史资料索引》。把知见材料公布于众，按照内容发给著者参阅。（三）举办小型资料展览会。2008年3月至4月30日，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举办了一次小型资料展览会，我把自己的部分读书笔记《目耕录》42册、剪报资料《刀耕录》40册和私人藏书97册，面向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著者公开展出，读者可以抄写、复印或拍照。资料者，天下之公器也。这样做，是为了方便大家，资源共享。（详《图书情报知识》2008年第3期卷首语）（四）互通情报。著者遇到什么问题，可随时通过各种方式向主编反映；主编如有什么新的想法，或有什么新的“发现”，可随时向著者“通气”。（五）借阅图书。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著者随时可以向主编借阅有关资料，主编藏书犹如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的“资料室”、“图书室”，全天候面向各位著者。（六）从2007年年底到2011年，先后八次召开编务会，并印发会议简报。每次会议重点强调两个问题：一是抓紧时间，时不我待。既然我们已经签订合同，作出承诺，就要做到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，“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”。二是创新意识，宁缺毋滥。大家认为，如果没有创新之处，宁可不写，不能徒灾梨枣。大家一致表示：要学习古人的传世意识和精品意识，珍惜这次机会，精心打造传世之作。否则，无法向读者交待，无脸见“江东父老”。此外，还就书名、编例具体问题展开讨论，统一认识。不过，还要说明两个问题：一是关于时间下限问题。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的时间下限一般定在辛亥革命（1911年）清代灭亡为止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个别图书的内容或超越此界。二是关于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的整合问题。由于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内容较广，涉及问题较多，加上各位著者认识水平不一，各书之间或有重复，间有不大统一的地方，敬祈读者谅解。当然，有些问题本来就是聚讼纷纭，还没有形成共识，著者各抒己见，也算是“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”吧！

现在，《中国图书文化史》终于出版了。我对各位著者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，没有各位著者的密切配合，编制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。我要感谢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、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

院、武汉大学出版社，没有它们的鼓励和支持，编制这套丛书也是不可能的。谢谢大家！

曹 之

2012年3月10日

了，就可以到供销社去卖一次，然后买几盒火柴、换几斤盐。有一次，我不小心把一个鸡蛋打破了，还痛哭了一场。几只母鸡就是我家的“银行”，卖鸡蛋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。油盐酱醋，全靠鸡蛋去换。尽管如此，在我的强烈要求下，先父还是用卖鸡蛋的钱为我订了一份《中国少年报》，每张报纸我都读过很多遍。有一次我按照报上介绍的方法，用一节电池、一个灯泡和两根铜丝，做了一个简易台灯。电路接通的一瞬间，小灯泡大放光明，我是多么高兴啊！我从明亮的灯光里，看到了希望，看到了前途。这当是我们山村有史以来的第一盏电灯，也是我所进行的第一次伟大的“科学实验”。我的“科研经费”第一次派上了用场。我奔走相告，让家乡的“闰土”们来家共享其乐。

十二岁那年，我考上了中学。在中学阶段，我最喜欢语文课，我读了《史记选译》、《左传选译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等著作，第一次发现天下之大、图书之多。我利用一切时间刻苦读书，课本上几十篇古文我倒背如流。星期日回家背粮，常常是肩扛20斤粮食，口不停吟，伴着琅琅书声，一次又一次地走完了40里的漫漫长途！我不仅背语文，还背政治、历史、英语等，把几十本书全部背得滚瓜烂熟。在背书的同时，我也开始写作。每次作文，都是“优秀”，老师在很多句子下画上了红圈，而且照例还要在班上评讲一通。在同学的心目中，我简直成为“小作家”了。有一次作文题是《言志》，我的文章在班上引起不小的轰动，当我奉命在班上读完之后，掌声雷动。因为当时还没有复印机，班上50位同学争相传抄，人手一份。当然，中学时代最难忘的还是校图书馆。图书馆的姚老师对我特别关照。业余时间我几乎全部泡在图书馆里。同学们有事找我，总会想到图书馆。记得有一次我在书库看书，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忘记了，姚老师下班，竟无意把我锁在书库里。为了更多地读书，我在填报高考志愿时，毫不犹豫地填上了“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”，以为图书馆学系守着图书馆，可以贪婪地读书。1964年考上大学之后，我第一次知道我国古代曾经有过陈振孙、毛晋、黄丕烈等许多藏书家。我多么希望有那么一天，也能有自己的藏书楼，有自己的“汲古阁”。我省吃俭用，为实现

《泊如斋藏书目录》自序

(代前言)

我于民国三十三年(农历甲申岁，公元 1944 年)出生于黄河南岸，黄河水哺育了我难忘的童年。总角之年，即嗜书如命。先父在旧社会念过几年私塾，家里有几册线装书。四岁那年，母亲撒手西去，几册发黄的线装书伴我度过了苦难的岁月。我最喜欢的一本是《绘图千家诗》，这是一册石印本，上图下文，手写体，油光纸，在先父的指点下，我学会的第一首诗是唐代杜牧的《清明》。

六岁那年，我上小学了。开学第一天是最高兴的日子。这一天，我第一次拿到了课本。当我从老师手中接过散发着墨香的课本时，我那娇嫩的小手微微发抖，像是接受了庄严的使命、历史的重托。那时家境贫寒，没有衣穿，没有饭吃，几册课本使我忘记了生活的艰辛。我每天放学回家的两件事就是“拨眼”和“数鸡蛋”。所谓“拨眼”就是给爷爷拨起倒下的眼睫毛。那时候，爷爷患了严重的眼疾，眼球上蒙上一层“白云”，睫毛经常倒下，有刺痛感。因为无钱医治，也只好听之任之。我成了家里的“眼科医生”，每天都要为爷爷拨几次倒睫。拨过之后，就舒服一些。所谓“数鸡蛋”，就是每天站在小凳子上，数一数窗台上瓦罐里的鸡蛋。攒够十来个

自己的理想努力奋斗。但是，由于经济条件太差，助学金每月只有13.5元，除了吃饭，所剩无几。尽管如此，在上大学的头两年，我还是买了几十册书，装了整整一个大书箱。武汉大学图书馆坐落在珞珈山之巅，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塔式建筑，和周围的亭台楼阁连在一起，构成国内罕见的布达拉宫式的巍峨建筑群。我无心欣赏如诗如画的美景，坚持每天到图书馆读书。由于图书馆阅览室座位太少，每天晚上都要去“抢”座位。我当时住在山下四区（今日“桂园”），六点钟吃过晚饭，就匆匆上山，用一本书放在座位上，表示“此座有主，请勿占用”，然后可以放心地到外面散散步。回忆当年，我到图书馆次数之多，在全校是罕见的。无论花开花落、寒来暑往，总可以在图书馆找到我的身影。为此我所在的6802班专门为我编了一个歇后语：“曹直上图书馆——风雨无阻。”

1966年6月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声讨武汉大学“三家村”的恶潮一浪高过一浪，绿树掩映的珞珈山连一张平静的书桌也放不下了。学校图书馆被封了。书店除了“红宝书”之外，没有其他书籍，我被卷入了“革命”的洪流之中。由于我性格内敛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虽然也曾有过冲动，但始终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，“打砸抢”更是与我无缘。后来，武斗升级，我干脆去当了“逍遥派”，不再“关心”国家大事了。

1968年大学毕业后，仓皇奔走之不暇，我先后流寓湖北随县、孝感、宜城等地。为了减轻搬运的麻烦和文字狱的困扰，我含着眼泪把仅有的一箱书烧的烧、丢的丢了。在湖北宜城，我经历了不堪回首的十年。我感到苦海无边，悲痛欲绝。在最困难的日子里，我仍然没有忘记读书。我读《毛泽东选集》、《鲁迅全集》，希望从中找到悲剧发生的原因。虽然路漫漫，雾重重，但并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，我耐心等待着出头之日，等待着机会。

机会终于到来了！1976年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大地春回，万象更新。1979年我以优异的成绩从湖北宜城师范考入母校，攻读硕士学位。重上珞珈山，感慨万千。没想到历史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：从珞珈山出发，经历了九死一生，又回到了珞珈山，用高低不平的脚印画了一个圆，真是十年一梦，梦断宜城！我重新认识到

知识的价值，我决心刻苦读书，把“文革”十年的损失补回来，开始疯狂购书和读书。在武大书店，经常可以看到我瘦小的身影；在古籍书市，经常可以看到我满载而归。不到一年时间，就购置了几百册书，装满了整整一个书架。然而自己的藏书毕竟是有限的，我更多的时间是跑图书馆。武大图书馆有一套影印的文渊阁本《四库全书》，我决心把它读完。每天早晨八点钟，我准时赶到图书馆，是图书馆的第一个读者。我有自己的固定座位（第四排第一号，靠左边窗口），然后一目十行地翻阅、摘录，大约用了三年时间，竟然走马观花地将1 500巨册《四库全书》翻检一过。除了浏览《四库全书》之外，我还重点阅读了《二十四史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全唐诗》、《全唐文》、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等大型古籍。我专门设立了《目耕录》，“目耕”者，以目耕田之意也。读书治学，犹如农夫之耕田，不可一日或间。《目耕录》就是我的读书笔记，至今已有60余册，抄写资料500多万言。总而言之，购书、读书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。到2000年，我已购置各类图书8 000余种、10 000余册，常用书籍已基本购齐。记得新居装修时，有人说：今非昔比，“拨眼”、“数鸡蛋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应该吊顶、包门，搞得豪华一点儿。我却坚持实用、简陋，并仿照唐代刘梦得的《陋室铭》写了一篇新的《陋室铭》：

田不在多，日食米半升。房不在大，夜眠一床梦^①。此是陋室，乐在其中。门泊东湖舟，窗含珞珈松^②。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有诸生。可以挥铁笔，阅金经。无电话之乱耳，无会议之劳形^③。荥阳十录斋^④，河阴读书井^⑤，孔子云：何陋之有？

注：①古人云：“良田万顷，日食二升；大厦千间，夜眠八尺。”这两句由此翻造而来。②杜甫《绝句》云：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这两句由此翻造而来。③余为一介布衣，终生不仕，无电话、手机之干扰，无会议、出差之忙碌。④“荥阳”是我的家乡，指河南省荥阳市；“十录斋”是我的室名之一，“十录”指藏书录、目耕录（读书笔记）、笔耕录（学术论文集）、刀耕录（剪报集）、鱼雁录（书信集）、临池录（书法集）、杏坛录（讲义集）、讽诵录、舟车录（诗歌集）和日

记录。⑤“河阴”指荥阳市广武镇，是我童年求学的地方。因在黄河南岸，故名。少时我曾在红薯窖中避寒读书，因窖深如井，故曰“读书井”。

2000年我搬进了四室二厅新居，专辟一厅一室收藏图书：厅曰“泊如斋”；室曰“汲古阁”。我终于有了自己的“汲古阁”，40年前的愿望终于实现了！

藏书何益？第一，增知识，利学习。图书就是知识，就是信息。它把我们带进一个广阔的天地，五洲四海尽收眼底。大至星球大战，小至伤风感冒，我的藏书堪称一部百科全书，可以随心所欲翻阅。信息时代需要图书，图书是打开知识宝库的万能钥匙。第二，查资料，利著书。我在《中国古籍编撰史》中曾说：“著书需要大量资料，资料来源不外两途：或借于人，或出于己。借于人则有数难：书主或有吝者，需摇尾乞怜，一难也；借期切竣，迫于时日，二难也；密行端楷，伏案赶抄，三难也。出于己者则不然，千万册图书时刻待命于左右，一旦需要，如探囊取物，举手之间，便可解决问题，免去诸多借抄之苦，大大提高了著书的效率。购书虽然耗费金钱，但却换取了宝贵的时间，堪称一本万利。”从1979年到2004年，我利用图书资料先后撰写了《中国古籍版本学》、《中国印刷术的起源》、《中国古籍编撰史》等著作，受到学术界的一致赞扬。第三，陶性情，养身体。宋尤袤云：“饥读之以当肉，寒读之以当裘，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，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。”还可以再加一句：病读之以当药。每当我身体不适的时候，徜徉书肆，就可以书到病除，精神焕发。迈步书房，如入仙区：题匾高挂，山水壁立；展阅书卷，纸白如玉；墨润如脂，书香四溢；如痴如醉，此乐何极！这里没有喧闹，没有铜臭，有文海书山，有圣贤之语。遇精彩处，抚卷长叹，拍案而起。或大笔一挥，或跋或记；或圈或点，痛快淋漓。有时还要钤上一方殷红的印章，平添几分生气。这里远离红尘，远离名利，没有勾心斗角，没有网络关系，只有一方净土，大写的“人”字顶天立地！

我的藏书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加工。书买回来，签名盖章之后，就分类上架了。一般图书，上架之前，粗翻一过，知其梗概而